

孙犁先生晚年爱读书,针对现实,不做直白发言,常引用古训,滋味别具。引用和引申,并非长篇累牍,而是言简意赅,点到为止,旁敲侧击,留白甚多;以古为镜,多象外之意。这样的书写,是那些借古喻今极愿意掉书袋而一发不可收者所不逮的。

试举几例。

在《我的位置和价值》一文中,谈自己,其实更是谈所有文人的位置和价值。文人好名,商人重利,自古而然。孙犁先生不说这些,直接引西汉末年刘盆子的古训:“旁人发现他是皇帝。盆子执意放牛,不做皇帝。能这样发现自己的位置 and 价值的,千古一人而已。”

放牛郎和做皇帝,位置悬殊,却乐趣不同;价值和价格,更不是一回事;这只是我读后多余的感喟。孙犁先生不扯这些,接着这样笔锋一转,怦然旁涉现实:“至于写几首诗,发表几篇小说,便吹牛说,发现了什么什么,其不自量,无自知之明,是非碰壁不可的。”最后,孙犁先生总结:“价值与位置,是辩证的统一,其基础为经济与政治。通俗言之,即金钱与时运。一般人不能自我发现,皆由社会或旁人发现。”

说到现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,孙犁先生是有些悲观的。1990年,他专门写过一篇《谈理解》的文章,举了春秋时期王僚的例子。王僚是吴国的国王,被其堂兄弟刺杀,如今的京剧《刺王僚》还在演,演的就是这个故事。孙犁先生举的这个例子,不说全剧,只干净利落地点出一句唱词:“旧剧《刺王僚》有唱词曰:虽然是兄弟们情意有,各人心机各人谋。每听到时,心里总是感慨万分的,惊心动魄的。”

为什么会感慨万分,惊心动魄?孙犁先生说:“古人云:隔行如隔山。俗话又说,知人知面不知心,都是经验之谈,不可不信。虽是同行,也不是那么容易相互理解的;即使是亲人,理解也不会是那么全面的。”

从同行,说到亲人,对理解的悲观,可谓痛彻心扉。这样的话,是沧桑跌宕经历过后的感喟,对于高喊“理解万岁”的人,听起来是刺耳的。

对于文人的言与行,孙犁先生读《旧唐书》时,专门引魏征为古训。魏征面对皇上的谏诤,“君臣相得,善始善终,是很不容易的”。魏征之所以能做到,皆在于其言行吻合当时的时势,而这样的时势,决定了言者和听者的相互态度;而言者的言,首先在于听者的行。这个关系,是不能错位的。

孙犁先生举出《旧唐书》中《魏征传》里的话:“智者不谏,谏或不智。智者尽言,国家之利”后,写道:这“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,然自古迄今,机缘难得。上下之间,情投之日少,猜忌之日多矣。”

最后,孙犁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:“魏征引用《文中子》的话:同言而信,则信在言前;同令而行,则诚在令外。我曾抄写在台历上。”文章便戛然而止。这里引用魏征的言与信、令和行的话,便是文人言行受制于时势的古训。信在言前,诚在令外,这里的信和诚、前与外,实际上并不仅指个人,而是时势。孙犁先生这样留白的文字,是饱经世事沧桑之后的痛彻之言。

论及史学道德,孙犁先生说:“第一条就是求实,第二条就是忘我。”

论及史才表现,孙犁先生说:“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,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。”看,在这两方面,首要的,都是真实。

孙犁先生引唐代史学家司马贞《史记索隐后序》中称赞司马迁的话“其人好奇而词省,故事核而文微”后,说:“事核就是真实,词省,文微,就是简练。”简练之外,强调的还是真实。

由此,孙犁先生由史学论及文学。他特别说:“当代人写当代事,牵扯太多,实在困难。不完全跳出圈外,就难以写好。”难以写好,难在能否写得真实。

孙犁先生又引沈约《宋书·自序》中的一段话:“进由时旨,退傍世情,垂之方来,难以取信。事属当时,多非实录。”强调的依然是真实。孙犁先生接着又引刘知己的话说:“‘拘于时’的著作,不易写好。”反复强调的,是“拘于实”,即如今我们很多纪实应时的文学作品。所谓“拘于实”,实际是和真正的真实相悖的,常是和“进由时旨”粘连的。

可惜,这样的话,没有人在意听。如今,“拘于时”“进由时旨”的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小说、散文、纪实文学,大行其势,并不在于写好写不好,而在于作者“进由时旨,退傍世情”。

孙犁先生看到传略中高长虹批判军阀的话:他们互相冲撞而无所谓爱憎,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用的东西,他们所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,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,短期的纷扰和长期的灭亡。

在这段话后面,孙犁先生有一段短短的议论:“读着这篇文章,我不知为什么,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。”

这段话意有所指,但我不知道孙犁先生由高长虹的话想到“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”,指的是什么人。大概,孙犁先生心里有数却不好明说吧?不过,既然已经指出,那么,那些“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”,必是存在过的。这些“英雄豪杰”,居然类比军阀,互相冲撞,冲锋陷阵,梦想占据……这样批评的意味,尽管并非明指,也足够强烈了。这便是孙犁先生文章中埋着的骨头。

这是孙犁先生1990年写的文章。30多年过去了,至今尚未有人指出孙犁先生这里说的“英雄豪杰”,是何许人也。是确有其人,还是泛指一种现象?对我这样的读者,倒也并不想深究其真相,文坛本就是一笔糊涂账。我关心的是,这样的“英雄豪杰”,如今,在文艺界是不是还在叱咤风云?

如今,虽有读书节和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,读书被宣传得热热闹闹,可那种功利化的读书风气,似乎依然盛行。愿意在寒窗前,坐冷板凳去读书,是一种愿景。

如今,作家一词,和专家一起,几近贬义,贬义甚浓,意含讥讽。早在1974年,面对当时的文坛,孙犁先生就已经生出过类似的感慨。他由此引清代方薰《山静居画论》一书里的话:“画学衰微,至今日而极矣,以狂怪狞恶为有气魄,以涂脂抹粉为

美观。市井喜之,上海派提倡之,日本之浅识者附和之。动开画会,自标声价,耳食者震之,辄为所惑。于是后生小子,羨其易致富裕而博浮名也,竟趋而师事之。习俗如斯……就易舍难,急于自表,而画道遂不可问矣。”

说的是画道,针对的则是文坛。动开会议,自标声价,易致富,博浮名,竟趋师之……竟也百年不衰。难怪孙犁先生慨叹:“今日报刊之热题:文学为何走入低谷?作家为何不值一文?阅读这段60年前的精彩文词,细而思之,所有困惑,不是都迎刃而解,拨开云雾,得见一片蓝天了吗?”

可能和多年前孙犁先生所说的情状,略有不同的是,如今,文学为何走入低谷?作家为何不值一文?这样的热题,多存于网上的众声喧哗,报刊上难见了。报刊上多见的是,文学正在迭起的高潮之中,作家在现(县)场走基层的热情之中。自然,对于文坛上这样种种衰微现象的指陈和批判,会被认为是唱衰文学和文坛。一唱衰,一衰微,虽都含有一个“衰”字,含义却不同,便各说各的,各写各的,各信各的。

对这样农书著书人的思想,他也给予了批评,并分析其原因:“中国士大夫,向以农村为根据地,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,仕宦所得,购置土地,兼开店铺。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,退居林下,以伺再起。习以为常,不以为非。在言论上,则是重农轻商的。”说得很客观、真切。

他对明代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和清代官修的《广群芳谱》的评价,也很有意思。他说:“《群芳谱》为明末未刊清修本,《广群芳谱》则为殿板之石印者。《四库提要》极为推崇御定之书,以贬低王氏原作,这不公平,王书自有其特色,非官书所能代替。”态度明确,眼光老辣。

在众多农书中,他独对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评价甚高:“徐光启的农书,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,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,新的种植方法,新的粮食品种,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,手工业技术。他出身农家,知识丰富,又得西洋技巧之传授,眼界宽,思想开放。因此,他的农学著述,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均为我国的文化遗产。”

如此认真读了这么多的农书,并对勤苦农民和稼穡农事,怀有这样深切感情的作家,如今少见了。读孙犁先生这样的文字,让我想起晚年的放翁,孙犁先生与放翁“人间只有躬耕是”“百世不忘耕稼业”的感情和心情,颇有相似之处。明白这一点,便也明白了孙犁先生自谓“耕堂”其心其意。

马上到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的日子了。一晃,孙犁先生竟然走了这么长的时间。对一位作家最好的纪念,莫过于认真读他的作品。谨以此文怀念孙犁先生。

1987年,孙犁先生写过一篇《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》。他说:“四库子部农家类,著录无多,其重

要者,余皆置备。”如此收藏丰富,在作家中,恐怕绝无仅有。

之所以收藏这么多农书,晚年的孙犁先生夫子自道,说得很坦白:“我购买这些书,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,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,习于农事,对于农书,易生感情而已。”

在这篇文章中,他写后魏的《齐民要术》、元代的《农书》《农桑辑要》、明代的《农政全书》、清代的《蚕桑萃编》以及《司牧安骥集》《群芳谱》等多种农书。能够真正阅览这些名目繁多的农书的作家,大概也不多。

孙犁读这些农书写下的笔记,都非常短,很少做内容介绍或点评,只写自己最感兴趣的那一点一滴。读《齐民要术》,他只写此书“农事多神话,所述非帝王之形象,乃农民之形象”。读《农书》,他只写“余粗读其文,而观其图,除蚕桑之事,颇为生疏;农耕器用,均与儿时所见所用者无异,中国农业之发展,长期近于停滞,原因甚多,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,乃其主要者”。

两者都写到农民,一是农民形象,对贾思勰多有赞许;一写农民生活,是自己读后的感慨,是对农民的关心。可以看出,所发议论,都出自作家之思之光阴,从稼穡农事中,看到农民的生活,乡村的历史。

在这些农书中,他读出对农民的感情,这是非常难得的、少见的。这种感情,不是到新农村走马观花的一时兴起,而是渗透其骨髓中的。他甚至对“古代农书,多有占验祝祷”之处,也怀有对农民的感情,而非一味地批评。他说:“其中自有迷信,然另一方面,也有一些实际经验,且证明古代农民朴实,每做一事,皆认真虔诚,整洁以处。”

对这些农书,他有清醒的认知和评判,他说:“历代农书,所记农事,多是农民经验的记录;所介绍的农具,都是已有农具的图形。这都是著书人从农民那里学来的,农民不要看。古代典训,农民看不懂。所以官刻农书,只是一种形式,就像每年立春之时,皇帝在先农坛的活动一样。”说的真实明白无误,却一针见血。

对这样农书著书人的思想,他也给予了批评,并分析其原因:“中国士大夫,向以农村为根据地,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,仕宦所得,购置土地,兼开店铺。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,退居林下,以伺再起。习以为常,不以为非。在言论上,则是重农轻商的。”说得很客观、真切。

他对明代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和清代官修的《广群芳谱》的评价,也很有意思。他说:“《群芳谱》为明末未刊清修本,《广群芳谱》则为殿板之石印者。《四库提要》极为推崇御定之书,以贬低王氏原作,这不公平,王书自有其特色,非官书所能代替。”态度明确,眼光老辣。

在众多农书中,他独对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评价甚高:“徐光启的农书,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,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,新的种植方法,新的粮食品种,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,手工业技术。他出身农家,知识丰富,又得西洋技巧之传授,眼界宽,思想开放。因此,他的农学著述,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均为我国的文化遗产。”

如此认真读了这么多的农书,并对勤苦农民和稼穡农事,怀有这样深切感情的作家,如今少见了。读孙犁先生这样的文字,让我想起晚年的放翁,孙犁先生与放翁“人间只有躬耕是”“百世不忘耕稼业”的感情和心情,颇有相似之处。明白这一点,便也明白了孙犁先生自谓“耕堂”其心其意。

马上到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的日子了。一晃,孙犁先生竟然走了这么长的时间。对一位作家最好的纪念,莫过于认真读他的作品。谨以此文怀念孙犁先生。

1987年,孙犁先生写过一篇《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》。他说:“四库子部农家类,著录无多,其重

研究孙犁作品的学者,现在开始收集孙犁散失的文稿了。河北省社科院编的《晋察冀文艺研究》1985年第1期中曾经披露,搜集整理晋察冀文艺运动史料的专家,偶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资料室找到了冀中区出刊的三期《红星》杂志,在创刊号上发现了孙犁的《现实主义文学论》,在第二期还有他已经忘记了《战斗文艺的形式论》。当把这两篇珍贵的文献复印件送给孙犁时,他高兴得笑了起来,捧着复印件爱不释手,并一再说:“这太好了,太好了!”这份失而复得的欣喜,就像重新找回失散多年的孩子,孙犁先生怎么能不激动呢?

非唯如此,又过了不久,1990年5月27日,同从晋察冀出来的老人曹国辉,在北京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孙犁早年的专著《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》,孙犁更是异常激动。就目前所知,此书存世仅有三本。时年78岁的孙犁,情不自禁地冒着酷暑先后写了《一本小书的发现》《〈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〉校读后记》两篇文章,在《人民日报》等媒体上发表,以表达这种喜悦的心情。

孙犁去世以后,有人陆续在《大公报》上发现了 he 写的《古都旧书摊巡礼》等文章,我也在《晋察冀日报》《抗敌三日刊》等上面发现了他写的多篇文章,以及数量可观的书信,这些都大大丰富了他的文学实践。特别是早期的作品,虽经历了漫长的时光,仍像 he 所说的那样,“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,随便向哪里一碰,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”,现在读起来仍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——说明它们都是历史和艺术的佼佼者,具有一般作家不可能达到的令人称羡的文学水平。

令人主张文集时汰除少作,因怕那些作品不登大雅之堂,会貽笑大方损害作者形象。但孙犁却不是这样, he 早期的作品也许看起来有些单纯,但是,在炮火连天里,孙犁一边打游击和敌人周旋,一边用手中的笔作武器,忠实地记录着自己与时代、与人民血肉相连、荣辱与共的感情与意志,并且在以后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里,一直用笔矢志不移地实践着自己的这种感情和意志,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。

那些找到的作品是珍贵的,而很多找不到的文稿,让人一想起便感到莫大的遗憾,准确地说是伤感。

孙犁散失的文稿,有些是寄给了一些志向相同的好同或战友,让他们在报刊上发表,例如由田间寄到大后方的一些文稿,没有发表的,很多就丢失了;即使是发表的,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,因为报刊未保存下来而散失的,也不在少数。

还有些文稿,战友们虽然保存得较好,后来都还给了孙犁,但因某种原因又佚失了, he 早期的单行本《语言简编》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再例如,康濯替孙犁保存了不少文稿,包括冀中油印本《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》,那段特殊时期结束后都整整齐齐地交给了孙犁,后来又却毁失了。孙犁自己也说,这实在是很可惜。

另有一些文稿却纯粹因为当年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失。例如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 he 写了两篇文章,一篇刊登出来,而另一篇刚打出清样,挂在报社走廊上任人批判,之后,就消失不见了。

相对来说,孙犁在战争中散失的文稿最多。在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里,特别是每年的秋冬季节,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总要遭受敌人巨大规模的残酷“扫

荡”。这时节,为了应付各种情况,反击敌人的“扫荡”,晋察冀边区各级机关团体干部就高度分散,深入区村直接协助推进各项战时工作。

1943年秋天,敌人又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进行“大扫荡”,正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工作的孙犁,又在山里打起了游击,这正是边区最为困难的时候,反“扫荡”整整进行了三个月,边区军民才打垮了进攻的日本侵略者。

刚刚回到机关的孙犁,听到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: he 的一些文稿散失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,1943年5月,晋察冀边区为贯彻延安文艺整风精神,大批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实际工作,田间、邵子南、林采、方冰、丁克辛、邓康、曼晴等都已下乡,孙犁还在6月28日写了《和下乡同志们的通信》,与这些下乡的战友互通信息,发表在边区刊物《文化界》上。9月中旬开始,日寇就对边区的北岳区进行了三个月之久的“大扫荡”——这次“大扫荡”确实是空前残酷的,晋察冀军民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,著名的地雷爆炸英雄李勇,正是在这次作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典型。

在反“扫荡”中,北岳区军民毙伤俘日伪军1.1万多人,但也使晋察冀的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八路军伤亡2427人,仅边区抗战剧社就牺牲了9人。

孙犁的战友、作家丁克辛(新中国成立后,一直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)到易县下乡,坚壁起来的不少稿子就在这次“扫荡”里散失了,其中包括丁克辛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、一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和十来万字短篇、约30万字的日记等。另外,散失的还有田间的大部分诗稿、邵子南的部分诗和散文稿,还有就是孙犁的文稿。

如今无从知晓其中有多少孙犁的稿子,以那时孙犁的身体状况而言,应当不是少数;现在可以看到,那一阶段孙犁的作品似乎不多,很多时间段没有作品,现在推测,其实 he 写了不少,是散失了。这是迄今为止,除孙犁亲手烧掉自己写的200余封信外,所知道的文稿散失最严重的一次。

这批散失文稿的坚壁方案,在当时被认为是再好不过的。那是在河北省阜平县山区牛栏村的一个老乡家里,人们在房角挖3个很深的土坑,把文稿严密包装好,放在瓮里,然后又把瓮深埋在土坑内,地面伪装得毫无痕迹,敲打地面也没有异声。埋藏时只有房东老汉一人知道。日本侵略者进村后,抓住了老汉,逼迫 he 交出埋藏的文稿,老人坚决不说,敌人就开始毒打老汉,一边打一边威逼 he 交代文稿的下落。可亲可敬的老人,至死也没有吐露文稿的半点消息——仅此一点,就能说明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——愿这位普通却无比崇高的老人安息。

老人被残害后,惨无人性的敌人把 he 的尸体抛到院子里,仍然不放过这间屋子。这群“野兽”用了大半天时间,在室内掘地三尺,终于挖出了这批文稿,并带走了它们。

时间过了整整83年,当事人都已作古。这批被敌人劫走的文稿,从此没有了下落;随着时间的不停流逝,找到它们将越来越难。情伤心房,意害肝肠;这批文稿被敌人劫走,多么令人难过。如果世界有奇迹,我想问一问,它们是否还留在世间?

2026年6月4日0:30改讠,在北京安华桥

情伤心房——孙犁散失文稿的往事

段华

意害肝肠